

# 工作、消费、新穷人

[英] 齐格蒙特·鲍曼 / 著 仇子明 李兰 / 译

ZYGMUNT BAUMAN

##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Second Edition



# 工作、消费、**新穷人**

[英] 齐格蒙特·鲍曼 / 著 仇子明 李兰 / 译

ZYGMUNT BAUMAN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工作、消费、新穷人 / (英)鲍曼著;仇子明、李兰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5

ISBN 978-7-5463-2929-1

I. ①工… II. ①鲍…②仇…③李… III. ①贫困—研究

IV. ①F1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0800 号

## 工作、消费、新穷人

责任编辑: 武 学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崑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号底商 A219-A226 邮编:100052)

发行电话: 010-63106240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 本: 960×1300 1/32

印 张: 6.75 字 数:141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3-2929-1

定 价: 22.00 元

# 目 录

译者导言:现代政治秩序解构的伦理危机…………… 1

第一版导言…………… 29

##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制工作伦理…………… 35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63

## 第二部分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95

第四章 工作伦理与新穷人阶级…………… 123

第五章 全球化世界的工作与冗余…………… 158

## 第三部分

第六章 新穷人的希望…………… 181

译名对照表…………… 206

# 译者导言：现代政治秩序 解构的伦理危机

## 一、消费主义的困境与虚伪的自由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鲍曼就开始关注消费主义和消费社会的议题，并将其作为批判的对象。在鲍曼看来，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后，消费注意占据了人们生活模式、价值选择、道德审美和文化认同的主导地位，尽管人们在消费社会中具有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一种带欺骗性的社会关系。

### (一) 消费社会与权力的转移

鲍曼注意到，西方社会已经由生产型过渡到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社会，消费社会的运转很少需要国家权力的支持，而是取决于消费者依赖市场的能力。消费社会的膨胀不仅吞噬了文化的独立性，也迫使知识分子从“立法者”阵营不得不退居“阐释者”阵营，而且还削弱了人们的社会交往能力和意愿。

据日本消费社会研究学者三浦展的论述，在消费主义境遇下，一部分人将步入“下流社会”：所谓“下流”不仅仅是指收入低，其人际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也全都较之一般人更为低下，概而言之，即是对

于全盘人生热情低下,其结果导致收入很难得到提高,独身的比例也极高。<sup>①</sup>

早在1982年出版的《阶级的记忆》一书中,鲍曼就回答了以工厂为斗争场所的生产型社会是如何转型为以市场为中心的消费社会。鲍曼关注的是,工厂的诞生及其作为社会斗争或道德经济主要场所在20世纪的衰弱,关注的是现代工业文化,所有这一切都与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情感相符:问题本身是工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只有消费欲望才能取代生产和工作伦理,并非成为社会动力的主导力量。在1987年出版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鲍曼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他试图把边沁、马克思、福柯与汤普森等人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结合起来。10年后,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详细而完整地阐释了他的观点,下文将重点论述。

2

消费市场通过诱惑性的消费文化而非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来实现社会整合。鲍曼认为,“消费文化”成为当前时代的重要特征,是当代社会运转的核心。在费瑟斯通看来,“消费文化”有两层涵义:首先,就经济的文化维度而言,符号化过程与物质产品的使用,体现的不仅是实用价值,而且还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其次,在文化产品的经济方面,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积累、竞争及垄断等市场原则在一起,运作于生活方式领域之中。<sup>②</sup>无论是对世界的看法,对未来的期待、生活节

---

<sup>①</sup> 三浦展:《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文汇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sup>②</sup> 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奏，对往事的回顾和关注焦点的特质、相关动机和日常议题，都是围绕消费市场的制度和变化而构成的。显然，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在市场中，不存在任何的权力中心，也没有创造这种权力中心的渴望；不存在一种可以产生权威性话语的位所，也不存在一种权力资源。鲍曼较为赞同布尔迪厄的观点，消费者时代的来临，意味着社会整合的核心统治模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新的统治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以诱惑取代镇压，以公共关系取代警察，以广告取代权威性，以创造出来的需求取代强制性规范。今天，使人联结社会的力量，是他们作为消费者的活动，是他们的由消费而构成的生活。<sup>③</sup>因此，消费者冲动和使行为服从于快乐的倾向都不必受到压抑，他们不必被严加看管。消费者欣然屈从于广告的威望，因而，这种信念不需要进行“合法化”。通过需要的剧增而非规范的周密，以使消费者的行为便于管理，从而不具有危险性。

3

对市场的依赖还由于人的社交能力的逐渐破坏——这种能力和积极的社交愿望，能够使得男女参与到社会关系之中，并维持这种关系的存在。由于参与者缺乏社交技能，于是人们只能避免建立一种稳定的相互关系。人们只能求助于可以进入市场的货品、服务和专家的意见，他们需要市场作为他们的确定性和自信的基础。对可市场化的物品和服务的依赖，很快便转变为一种对市场的从属。<sup>④</sup>

在鲍曼看来，消费市场最要命的影响是那种承诺，亦即承诺

---

<sup>③</sup> 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224页。

<sup>④</sup> 同上，第228-231页。

有一种可以治疗你所有折磨的药方,它就在某个商店的某个角落,而且如果你够认真寻找,你就可以找到它。这种承诺的后遗症有三个,每一种都很要命。一种是“社会的去技术化”,亦即忽略学习与他人讨论及协商的技术以找出办法摆脱麻烦,并且相信那种技术不真的是必要的,因为可以在下一个购物行为中以较不费力且花费较少的方式解决问题。另一种是处理生活问题就像吸收消费品一样,那是一种单独的问题,不能从和他人的合作中达成太多效果。第三种后遗症可以说是以对抗症状来代替治疗疾病;不管你是多精明、多机灵的消费者,你都不会在商店中找到造成你困扰的社会因素的治疗药方,只能找到如何镇定安抚社会因素所造成的考验和苦难的配方。<sup>⑤</sup>鲍曼在一次对话中,曾明确地告诉泰斯特,他对于消费主义的批判是:消费者的兴起是公民的没落,越是有技巧的消费者,越是愚蠢的公民。

4

鲍曼认为,后现代状态有两个原因适合消费社会新出现的社会关系模式。首先,在消费社会,原则上危险的是象征而不是有限的资源。权力对抗不再需要严格的零和博弈,有一种通过另外的场景的新的象征手段来重新确定自我的自由,而旧的权力对抗实行丧失。其次,更深刻的是,国家权力在消费社会的展示是这样的,消费社会可以承受各种丰富的观点,因为所有观点都能不会对国家政府的地位产生威胁。权力不再取决于统治的意识形态,因此对意识形态的挑战丧失其意义,社会和系统整合与个人认同一样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通过消费市场来构建的。国

---

<sup>⑤</sup> 鲍曼、泰斯特:《与鲍曼对话》,杨淑娇译,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126-127页。



家丧失其中心地位的作用，权力中心转移到了市场领域，解放的推动力也从生产转向消费，这相应就减轻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sup>⑥</sup>

## (二) 消费自由的欺骗性

在福特主义当道的生产盛会中，人们的行动和思想都没有自由可言，完全为机械化的工作效率所束缚。然而，在消费者逐渐主导社会化话语权的消费主义时代，人们在消费市场上具有充分的自由空间，无论生活方式、审美价值还是对社会的联系都以消费为纽带。但是，这种消费自由是否在政治学意义上实现了自由呢？鲍曼并不这么认为，他试图揭开消费自由的欺骗性。

在鲍曼看来，“自由只有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时方能存在。自由不是一种所有权或个人对自身的占有，而是一种与个体间的某种差异相关的属性。只有把它看作过去或现在某些状态间的对立面，自由才有意义。”<sup>⑦</sup>同时，在鲍曼看来，自由还是特定社会内部身份地位分化的标志，“近来，已经注入了消费领域。个体自由首先是作为消费者的自由，这种消费者自由以高效运作的市场存在为基础，而反过来它又是确保市场存在的条件。”<sup>⑧</sup>从消费者立场看，消费世界不同于财富和权力生产于分配，它摆脱了消除竞争和垄断功能的根源。尽管竞争还继续以

5

---

<sup>⑥</sup> Zygmunt Bauman (1992): *Intimacy of postmodernity*, Routledge. p. 45.

<sup>⑦</sup> 齐格蒙特·鲍曼：《自由》，杨光、蒋焕新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导言，第10页。

<sup>⑧</sup> 齐格蒙特·鲍曼：《自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导言，第10-11页。

象征符号的区别和独特性的行事表现出来,但这不是社会地位本身而是地位之间的差异。因此,可以说,消费自由的对立面正是安全感,行使自由不能以牺牲身体和精神安全基础的确定性为代价。

6 消费被确定为自由的一个竞技场,参与象征符号竞争的自由个体由此释放出大量的能量,摆脱了由物质需要决定实用性的原则,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感官和审美判断的瞬间满足的快乐原则。因此,在消费市场,自由和确定性、独立性和集体生活彼此共处,人们可以依赖于市场来享有自由,而不必付出不安全感的代价。尽管消费社会仅仅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其本身无所谓道德的正反面,但在鲍曼看来,必须指出消费自由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表现在消费欲望主导的自由、快乐和幸福都是虚假的,而且是永难满足的。由于购物和消费品的依赖性是所有自由的必要条件,而自由依赖消费者选择的程度是通过使用大量生产和推销的商品,从而最普遍且有诱惑力的是,把生活视为一系列消费选择的经历。消费除了自身的维持和强化外没有别的目的,消费也无需其他事务来证明其合理性。此外,购物和消费只能使消费者得到瞬间的满足,理想的消费自由就是——“欲壑难填”(desires shunning satisfaction),使一切理性和激情都以满足和提升欲望为目标才有意义。消费市场为了增强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需要大量的时尚和广告来诱惑他们时刻处于亢奋和永不满足的状态。

另一方面,消费自由最反对的就是为生存而消费的“传统消费者”,这些人是消费社会的“公敌”。他们坚持关于消费需要的传统定义,换言之,他们把需要视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紧张

状态,把幸福视为消除紧张,恢复平衡,返回到需要满足时的那种平衡和平静状态;对他们而言,消费并不是“绝对的以本身为目的”,并不是“天职”,幸福状态的终点就是:“我已经获得了所有的需要,我不需要再努力了。”<sup>⑨</sup>一旦满足了需要,消费活动就失去了意义,但消费社会却宣称需要是不可能满足的,消费活动是一系列欲望,一切幸福和快乐都伴随消费过程转瞬即逝,都在不确定的消费中寻求满足。

### (三)消费社会与政治疏离

在资本主义初期的社会层面,工作提供了训练和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也是各种社会“怨恨”(舍勒语)融合的焦点和宣泄愤怒的战场;在体制层面,维系和再生经济和政治结构都取决于生产者。在资本主义上升期的特征是,工作同时占据了个人、社会及体系层面的中心,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体系管理协调一致的纽带。但是,在消费社会,工作的中心地位却被消费者取代。

在鲍曼看来,消费主义是分析消费社会的重要范畴。“消费型的选择在当代社会中扮演了某种中心的角色,这与在现代社会中通常由工作、职业、就业等所扮演的角色相类似。可以说,消费主义要体现在对象征性物质的生产、分配、欲求、获得和使用上。消费,不止是一种满足物质欲求或精神需要的行为,它还是一种处于各种目的和需要对象征物进行操纵的行为。所以,强调象征性物质的重要性就显得很必要。在生

---

<sup>⑨</sup> 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活层面上,消费是为了达到建构身份、建构自身亦即建构社会关系等目的;在社会层面上,消费是为了支撑体制、团体、机构等的存在与继续运作;在制度层面上,消费则是为了保障种种条件的再生产,而正是这些条件使得所有上述这些活动得以成为可能。”<sup>⑩</sup>

当代社会是围绕消费来整合的,同时,自我认同和个人欲望的满足也是通过消费来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鲍曼指出,自由和个人命运已经逐渐变得私人化了。但是,不管能不能承受参与消费自由,不断私人化的生活都逐渐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而免于约束的政治则加深了私人化的程度,这就在培植了道德冷漠的同时,也培植了政治疏离。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消费选择成为人类生活世界寻求意义和追加价值的核心。——“我买,故我在!”

8 比哈贝马斯和奥菲更激进的是,在分析资本主义危机时,鲍曼强调消费、消费者、消费主义的历史意义是解读后现代政治的关键。因为消费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看作是从政治中的制度化退出,或者作为一种强力的诱惑,鼓励这消费者脱离刻板单调的政治立场和理性的官僚政治。消费社会一种新兴的权力看不出是理性与激情、谨慎与自我放纵、工作与懒惰之间的对立,其扩展只体现为一个文化蜕变的进程,消费社会的受压迫者被排斥于市场之外,为国家权力继续管理。该群体在权力上没有前途,他们是沉默的、碎片化的,并有可能进一步退化为“社会的废弃物”。

与另外一消费社会理论家鲍德里亚的讽刺不同,鲍曼对消

---

<sup>⑩</sup> Zygmunt Bauman (1992): *Intimacy of postmodernity*, Routledge. p. 50.

费社会的批判是正面的直接回应。鲍曼指出：对于消费者体制来说，快乐消费的消费者是必要的；对于个体消费者而言，消费是一种职责，甚至还可能是最重要的职责。<sup>①</sup>消费者在社会层面上感到消费的压力，因为他为了在象征意义上与同辈人保持一致，为了发展一个与独特性和差异性相一致的自我认同，为了获得社会的赞同；在体制层面上的消费压力来自提供消费者商品的企业，这些压力是压倒性的、消费者不仅作为一种努力去经历这些压力，而且也作为快乐和喜悦的来源去承受压力。当然，生产和消费的控制结果是一种强有力而更安全的资本主义体制。至少，这种体制是通过个人自由而不是通过压迫来进行自身再生产的，这正是可怕之处。

## 二、新穷人的权利

9

社会底层的普通大众的生存境况是鲍曼自始至终的关注对象，“甚至是构成其全部学术生涯的现实素材。”<sup>②</sup>鲍曼有多本著作专门论述了消费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贫穷问题。对鲍曼而言，历史上的贫穷是一种物质上的匮乏，但在精神上是平等的，但在消费社会，穷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平等都被剥夺了，穷人的尊严受到破坏，从而，穷人将永远处于社会底层，并无法团结起来对抗上层阶级。这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全世界无产阶级

---

<sup>①</sup> Zygmunt Bauman (1992): *Intimation of postmodernity*, Routledge. p. 50.

<sup>②</sup> 郭台辉：《齐格蒙特·鲍曼思想中的个体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页。

联合起来”的行动指南偏离了，鲍曼开始转向后马克思主义。

## (一)从穷人到新穷人

人类历史上的贫穷意味着身体生存的危机，死于饥饿、死于疾病或其他威胁。鲍曼认为，“每个我们已知的社会对穷人都抱持这特有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是惧怕与讨厌，另一方面是怜悯与同情，两者不安地混杂在一起。两种成分都不可或缺。前者容许为了维护秩序而严酷处置穷人；后者强调身处标准之下者的悲惨命运，这种命运使得那些遵循规范的人经受的一切痛苦，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以这种间接迂回的方式，纵有种种不是，穷人在复制社会秩序及保证遵从规范上，可说是扮演了有用的角色。然而，每个社会都根据其特定的秩序及规范模式，以其自身的形象建构了穷人，并为其存在提供不同解释，发现不同的穷人用途，并发展对付贫穷的不同策略。”<sup>⑬</sup>另一方面，对于社会来说，即使穷人的状况提升到纯粹是生存的层面上时，贫穷总是意味着营养不良，不足以保障人们对抗气候的恶劣和无家可归。所有关于穷人的界定都与既定社会视为衣食住行的当下标准相关联。所以，贫穷的内涵和穷人的身份从前现代经过现代到当前的消费社会必然具有不同的历史意义。

鲍曼指出，“前现代欧洲，比起现代的承继者，更能发掘穷人的重要功能。在前现代天主教的欧洲，穷人一如其他人事物，都是上帝的子民，是‘神圣的存有之链’中无可或缺的一环；穷人是上帝的造物，就像其他万物一样，在现代的去神圣化或‘除

---

<sup>⑬</sup>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与新贫》，王志弘译，巨流图书公司，2006年版，第119-120页。

魅’(dienchanted)以前,各有意义和目的。穷人饱受苦难,这些折磨是对原罪的忏悔,也是救赎的保证。”<sup>⑭</sup>亦如福柯所言,“在整个基督教传统中,‘穷人’是真实具体的存在,是一种有血有肉的存在,是一种永远个性化的需要帮助的形象,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上帝的象征媒介。”<sup>⑮</sup>因此,穷人是上帝赐予众人的恩泽:如此才有机会自我牺牲,过着良善的生活,也才能悔过而得到上帝的庇护。

在除魅的世界里,过去的种种不会因其偶然地存在那里,便拥有存在的权利,过往的一切,都必须为其存在的权利提出正当合理的证据。18世纪的人发现,“穷人”并不是作为一种具体的最终的现实而存在着;在他们身上,两种不同的现实长期以来一直被混淆在一起。一方面是“贫困”,即商品和金钱匮乏。另一方面是“人口”。这不是一个受财富波动支配的消极因素,而是一种直接影响经济行事和财富生产的力量……贫困此时正在逐渐从以往的道德混合体中脱颖而出,贫困变成了一种经济现象。<sup>⑯</sup>更重要的是,与前现代欧洲相较,这个现代性的美丽新世界自行制定规则,没有所谓的理所当然,既存的一切事物都必须纳入理性的审视,认为自身的权威没有限度,尤其排斥“死者权势大过生者”、传统权威以及承继的传统知识和习俗。直到19世纪工业革命前,穷人既不是生产者,也不是消费者,毫无立足之地。

---

<sup>⑭</sup>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与新贫》,王志弘译,巨流图书公司,2006年版,第120页。

<sup>⑮</sup>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4页。

<sup>⑯</sup> 同上,第213-215页。

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后,工业主义的迅猛发展需要大量的穷人成为生产流水线的劳动力,正由于此,无产者才可能结合成强大的阶级力量,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确立起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地位。也正是在此背景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就指出:“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sup>①7</sup>在物质层面,穷人是匮乏的,但在精神层面,穷人却与富人是均等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甚至是更先进的社会政治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的先驱力量。事实上,只有在工业主义高度发达的历史阶段,作为无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的工人阶级才能凝聚成反抗资本主义秩序规范的力量,因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财富生产来自于劳动力,人口的增加为工业降低成本而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力的贫困程度与创造财富的价值成正比。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穷人这一角色之所以是必要的,原因不仅在于它不可能被压制住,还在于它使财富的积累变得可能。如果穷人多劳动而少消费,就能使国家富强,使国家致力于经营土地、殖民地、矿山,生产行销世界的产品。总之,没有穷人,国家就会贫穷。贫困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因素。穷人成为国家的基础,造就了国家的荣耀。”<sup>①8</sup>

在消费取代生产并成为社会运转的轴心的消费社会,穷人无力再与富人和精英势均力敌,而是成为毫无用途的“废弃的

---

<sup>①7</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

<sup>①8</sup>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3-214页。



生命”和“有缺陷的消费者”。鲍曼认为，贫穷现象不能仅仅简单化为物质的剥夺和身体的灾难，它还是一种境况和心理境况。因为人类存在的特性是通过在既定社会中实践体面的生活的标准来衡量的，而无力遵循这种标准本身就是灾难、恐惧感和耻辱感自我增强的原因。贫穷意味着被排斥在正常生活之外，这必然导致穷人的耻辱感、内疚感以及自尊的沦落。贫穷也意味着无力追求既定社会中的幸福生活，这就导致怨恨的积压，并以暴力行动和自我反抗的形式喷发出来。

在消费社会，正常的生活是消费者的生活，他们为了快乐的感官和现场的经历而沉迷于琳琅满目的商品。因此，与其他社会形态相同的地方是，消费社会的穷人是那些无法达到正常生活的人，更不用说实现幸福生活。但在消费社会，不同的却是，“首先且最重要的乃是有缺陷、欠缺、不完美且不充足的——换言之，就是不合时宜的——消费者。”<sup>①9</sup>相应地，当今资本主义的主要对手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作为传统消费者的穷人。因为穷人去购买商品，不是因为商品处于热销中或宣传深入，而仅仅是因为商品本身就是他们维持基本生活的急需用品。所以，只要社会变迁还是急需按当代资本主义的逻辑发展，穷人就处于迷失而无助的状态，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吸引他们反抗压迫的欲望，更不用说试图寻求新的体制。

消费文化所界定的幸福生活是确保新颖时尚而没有厌烦的生活，而且与消费文化相互补充的消费市场则要确保生活的富足与安逸。鲍曼认同“贫穷会因为经济成长而加剧”的观点。

---

<sup>①9</sup>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与新贫》，王志弘译，巨流图书公司，2006年版，第53页。